

蓦然回首

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



深

自省

新

扬弃

殊

奋进

美

陈江风 著

天文与人文

——独异的华夏天文文化观念

陈江风 著

天文与人文

——独异的华夏天文文化观念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北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

特约编辑 廖 奔
封面设计 卢 宏
装帧设计 黄耀子

天文与人文

陈江风 著

*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1201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2印张 13.5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9-180-3/C·25 定价2.30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随着改革和开放的逐步深入，大量的西方思潮涌进中国。传统的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和挑战。然而，正当我们以期待的心情吸取西方文化中符合中国国情的部分时，西方学者却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摄取大量的成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正是许多学者在猎取西方思潮之际所不断触发的共同感受。有鉴于此，我们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了这套名为“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大型系列丛书。该丛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作辩证的分析，并尽可能地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将某种文化现象放到世界文化或东方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和探讨。本丛书的选题注重历史的延续性，也注意截取特定时期的横断面，有的还从某一特定点立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宗教形态、思维模式等作精辟的分析，并与中国目前的改革和开放大业紧密结合，肯定传统文化中

的精华并探讨发扬光大它的途径，摒弃其中糟粕并指出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阻碍作用，为中国的四化大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本丛书面向积极投身于改革和十分关心改革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各类青年、大专院校学生、各类社会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社会读者，海外华人世界一切关心中国改革大业、关心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人士，力求观点正确，富有新意，深入浅出，可读性强。意新文美，将是丛书的重要特色。全部丛书均由近年来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编写，由我公司分辑陆续出版。

总 序

改革的浪潮在回春的大地上迅猛激荡。每个人都怀着鼎新的期望，每个人的心头又都泛起革故的悸动。当一片飞叶被远风捎来时，我们因分不清它来自仙草还是毒藤而迟疑犹豫；当一堆泥沙被湍流冲去时，我们为说不定它含金蕴宝还是藏垢纳污而烦躁不安。我们想借他人健身之术使自己速强快壮，同时又不愿失去龙的传人的奕奕神采、翩翩风度。

我们蓦然回首。

我们为悠久的历史而自豪，为灿烂的文化而骄傲。然而我们也想说——

历史是功绩与罪恶的混合，文化是文明和愚昧的集结。我们的血管里，跳动着五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也积沉着长期停滞时的糟粕。跳动的要升华，积沉的要歇息。升华的要给予动力，歇息的要加以刺激。

我们想用深邃的目光穿透历史的表象，触及其底层奥秘；我们想以犀利的笔锋撕破世俗

的陋网，痛诋其惰性积习；我们想向世界展现瑰丽，重新塑造炎黄子孙的形象；我们更想为国家的繁盛和民族的腾飞，歌而舞，鼓而呼。

然而我们又什么都不想，只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昨天，我们还被称为早晨的太阳，今天，即可为万里晴空辐射热量。也许某一时刻，会有云，把我们遮掩，但我们坚信：只要有光明，中华就有希望。

蓦然回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丛书编辑委员会

引言

公元前二百零六年，巨鹿之战告捷，秦军主力损失殆尽。秦末农民起义从此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十月，刘邦先于项羽兵临咸阳城下。和着刘邦军队进驻咸阳的胜利凯歌，茫茫夜空出现了一种瑰丽的天象。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鬼遣神差般地一一相随，会聚于“井宿”所在的天区。立刻，深兰的天幕上好像点缀了一串璀灿的珍珠，一颗颗焕发着奇异的光芒。于是，咸阳城里，凯歌未散，吹呼又起……

这是一次极为罕见的天文奇观——“五星连珠”。如果是今天，人们在惊叹造化神工之余，热衷的是科学的考察与观测。但是，这一天体运行形成的自然景观，当年却被作为“天”的启示，鼓午着于此之后被封为汉王的刘邦及其政治集团，私下酝酿着一场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史记·天官书》与《汉书·天文志》相继记载了这一天象：“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井宿）……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

五年之后，刘邦终于如愿以偿。他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手项羽手中，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为时四百年的汉王朝。华夏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从此形成了“汉民族”的文化概念。可以想见，天文现象一旦转换成“受命于天”的精神支柱，当年是怎样作为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成

千上万人前赴后继，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毫不动摇，朝着“天意”既定的目标前进。

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精神力量！发生在殷、周嬗替时的另一个故事可以告诉我们，找到找不到这种精神的依托，会对政治及政治家的决策产生如何的影响。

公元前十一世纪的牧野之战，决定了殷商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姬周王朝代之而起。王朝初立，举国欢腾。最高统治者武王姬发却闷闷不乐。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茶饭无心、彻夜难眠，表现为一种惴惴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周公——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对此颇为疑惑，于是前往询问缘由。武王回答说，我忠实地“依天室”的意志，推翻了殷商王朝。作为一个受命于天的人主，在王朝建立之后，首要的大事是“定天保，依天室”。而现在却迟迟“未定天保”，怎么能够吃得香、睡得着呢❶？

“天保”，原指天之中心。保，本义是伞盖的中心部件。在中国天文观念中，帝星居于天之中心——北极，满天的星星围绕它转，形状恰似一把大伞，因而借用伞盖中心之词称天之中心为天保。武王这里的“天保”表现法天意识，是词义的引申，借指政治中心，亦即国都。

武王在对话中阐述了定都的原则，即“定天保，依天室”，以天的格局制造国都。为此，他“南望过于三涂，北望过于有岳，丕愿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❷——在进行了四方地望考察之后，终于在伊、洛平原找到了“无

❶❷ 参阅《逸周书·度邑》。

远天室”的地之中心——“土中”。看来，他的“依天室”，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外壳上的“为人君者，取象于天”^①，而是从形制到方位都要彻头彻尾地与天一致。天帝的宫殿——紫微宫是天之中心，作为天之骄子的人君，其宫殿——天保，必须亦步亦趋，居于地之中心。可见这是多么虔诚，多么富有原则的人对于天的认同意识。

成王即位，天保落成。人们欣喜若狂，对于新兴的“天邑周”王朝的狂热的自信情绪达到了顶峰。《诗经·小雅·天保》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种热烈的情绪。诗文竟连续三章感叹“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其中的欣喜、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不仅突出了定天保在周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天道崇拜意识。周人自信：如果“依天室”布局制建天保，则神明享食、祖宗护祐、国祚长久。周人便可以“受天永命”^②。正象诗文中反复吟唱的那样，从此以后“以莫不兴”，“以莫不增”，“以莫不庶”，国家可以“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蹇不崩”，欣欣向荣，千秋万世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周王朝入主中原之前，原已有丰、镐两个经营多年的都城。根据《尚书·召诰》可知，周人这样处心积虑、废寝忘食地另选都邑，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地望考察，几代人不遗余力地精心营建，原来完全是为了使“天知”——知我周朝初受天命即“服于土中”，以求与“天帝”

① 董仲舒：《春秋繁露》。

② 《尚书·召诰》。

感通；知我初即位，即“作天邑”、“配皇天”；知我虔诚“敬德”，效忠于“帝”。

这种殷勤的“自我表现”真叫现代人莫名其妙。在这不可思议的表象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学、社会学的道理。德国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著名的《人论》中揭示了古代社会天文崇拜的社会学基础：“为了组织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生活，转向天上被证明是必要的。似乎没有任何人类现象能解释它自身”，而要借助于“天”这种“充满魔术般的，神圣的和恶魔般的力量”。“如果人首先把它的眼光指向天上，那并不是为了满足单纯的理智好奇心。人在天上所真正寻找的乃是他自己的倒影和他那人的世界的秩序。”

由此看来，无论是周武王“定天保，依天室”，还是汉刘邦顶礼天象，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对天神的尊奉，而是为了“他那人的世界的秩序”。周武王的对手是一个统治天下数百年，拥有成熟文化的殷商民族。相比之下，短期内尚不易取得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一统天下。为了政治、为了“秩序”，武王必须把自己打扮成受命于天的圣君，必须废弃自己赖以崛起的旧都——丰京、镐京，而定天保于洛邑，治天下于“土中”。刘邦，一个出身市井的无赖，沛县一个小小的亭长，面对群雄并峙，天下纷纷的混乱局面，要统兵百万，号令诸侯，不得不“转向天上被证明”，借天象以贴金，拉大旗作虎皮，以把自己乔装成“真龙天子”，名正言顺地驾驭宇内。

这就是他们的动机！天象，以它的神圣与不可思议成为古人经常借用的不可思议的万能法宝。由此升发开去，整个

天人感应神学体系的政治目的就昭然若揭了。天象，可以为改朝换代的借口：三代、周秦以至明清，无一不是如此；天象，又可以成为平治天下的依据：以天威“谴告”，完成政治机制的内部调节，保证国家机器良性运转、实现国祚的长治久安。于是，政治家据之以修明政治、调解矛盾、任免官吏、制止战争、发展往来、促进生产……

应该说这是中国人的理智与特异的灵性使然。就总体上讲，我们的前人成功地利用了来源于原始社会的天体自然崇拜，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心理积淀，创造了曾为近代西方文化先驱们所景仰的理想“秩序”与文化。一位西方学者说：

“秩序……是从自然界模仿来的。人类通过对浩瀚的天体规模的观察不仅发现了把秩序引入生活的模式，而且也找到了这种作法的出发点。”^①中国人很早就明白了这一点，并在自己文明的历程中形成了独异的特色。而西方人对此的领悟似乎较晚。诚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应该有理由希望在最初的人类活动中秩序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取得它的地位；而且我们可能很惊讶：这种情况居然没有发生，而是恰恰相反，人类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一种没有规则和不可靠的天性，并且需要通过艰苦的训练，他们才能学会以天体模式为榜样。”^②

与西方的情况相反，中国人远在上古的三代，已经在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②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以天体模式为榜样”，建立自己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一以贯之的“原型”在起作用，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形成了超稳定的板结模式，并以积淀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今天的文明。

我这里借用了“原型”的概念，因为它的确非常适宜表述华夏天文文化观念的发展脉络。它是一个以不同形式出现在华夏文明之中，始终伴随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精灵。《易·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对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中国“人文”一开始就是从“天文”中推导出来的。观天文是为了指导人文，实现“以德化天下”。这里体现出的正是华夏民族自原始先民即已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圣人，其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目的是为了“治乱存亡”、“寿夭吉凶”^②。“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③，何尝不是为了人伦，政治？类似论断在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凡谈及天文，必涉及人事。

大概是华夏民族重实际，黜玄想的民族性格在起作用，这些论断总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浓重的实用主义特点。由此，正说明华夏初民是在“组织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生活”以建立正常秩序的实践中，意识到了自己对许多事

① 《易·系辞传》。

② 《吕氏春秋·序意》。

③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情的无能为力，必须借用一种神秘的，有绝对号召力的力量来统一人的思想与行动，如此才能实现建立正常秩序的目的。在他们面临的所有自然物中，日月星辰的天体运行与分布较为直观地给了他们以“理想秩序”的启示，故而在依赖、恐惧、崇拜之余，在他们的意识中构建起了一个超自然力的理想的神秘王国——天界社会。于是人懂得了借助它来掩饰（弥补）自己力量的不足、达到自己向往的目的。

这种理论的着眼点不可能不落脚在“用”——指导社会实践的意义之上。因此，中国天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社会天文学的显著特点。它不可能是“由抽象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和面所组成的”“单纯的理论空间”^①，而是制约人文，服务社会的有力武器。

中国人保持传统的能力是举世惊服的。而中国社会天文学的特点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中国天文学“是从最早的时期开始就已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的一条连续的线索”，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从敬天的‘宗教’中自然产生的，是从那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甚至是一个‘伦理上的统一体’的观点产生的”^②。李约瑟虽然是在写中国科技史，但他看到了中国天文学的“社会学”内容，他甚至认为“天文和历史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③。其观点可谓独具慧眼。

①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2页。

这个在各个文化子系统中“反复出现”“反复使用，并因此具有了约定性”^①的“连续的线索”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型”。大到国家政体、官制、都城、建筑、小到诗文、书画、文字，几乎中国文化的各种基本形式都在祖述它的天文之源，并因此而形成了具有浓厚宇宙色彩的天人合一文化系统，成就了华夏独异的文化特色。

由于历史的前进，文化的发展，不同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审美标准在不断发生变化。某一文化母题要适应时代，必须不断地“置换变形”，以与新时代相和谐。比如民间信奉的“寿星佬”起源于原始时代的天体崇拜。最初是因为那颗“老人星”本身超一般的亮度引起人们的注意与偏爱，以为它是吉祥的化身，从而产生对这一具体的星象的崇拜。到了秦汉顺应统治者“长治久安”的理想规置换变形为象征国家安定的神。宋以后又由“神”再置换变形为“人”——一相貌古怪而和蔼可亲的长者形象（详见第六章）。这是一个线索清晰的天体崇拜演以成俗的置换变形过程：

具体的天体——抽象的星神——和蔼的老人

而许多情况则复杂得多，并非都是用图表形式能够说得清楚。如帝王必居“土中”的思想源于对“北辰（即北极）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②的天之秩序的体认。到了殷周之际，武王建天保测“土中”而筑都邑，已经开始追求形式上的与天同构。秦汉隋唐各代，作为“法天”的指导思想居“土中”

① 叶舒宪语。转引自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② 《论语·为政》。

的追求没变，但各自有其理论坐标，各自有其自我实现“土中”的方法（详参第五章），虽然形式上都追求与天同构，作为“原型”则在不断地置换变形。

降及明清，“土中”思想这一原型表现在宫廷建筑中则是建筑群体本身通过中轴线与建筑群对角线的交叉点来确定“天阙”之“中”——太和殿的特隆地位。这时的宫廷已不要求必居“土中”，这一思想已经演变成为象征性的中心线、中心点来表现。形式不同，实质相一。在类似不断的置换变形过程中，各文化部类中的“原型”的本来面目变得模糊了，现代生活中的事象与原始文化的内在联系虽在，却已难以辨析。唯其如此，人文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担子才更显得重要。我们这本小书，即想试用“原型”的理论，粗略地梳理天文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填充这个久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冷落的角落。

中国古代天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天文学”，理应受到人文科学研究的注意。天文被人文科学所冷落仅仅是现、当代的事。造成这种学术上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其原因主要是现代所谓“两种文化”分工过于“精确”所致。

英国著名学者查里斯·帕希·斯诺在他所作的风靡世界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中曾明确指出，当今社会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①。

① 参阅陈恒六译：《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序，第3页。

本来某一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彼此混同到分工明确，是一件好事，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然而任何事情的绝对化都可能适得其反。在人类不自觉的时代，社会意识形态诸分支，如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浑噩一体，表现为对社会历史极大的被动依附性。往往在同一观念产品中，积淀了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相互间能和谐地共处一体，没有排它性，亦不存在特殊的质的规定性。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进入自觉的时期，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比如现、当代，不仅有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工，而且各学科内部分工也日趋精细，表现出一种现代气派。但是，由此而使许多交叉科学受到冷落，出现了研究空档，许多学科被肢解，无法宏观把握。学科与学科之间，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造成了极大弊端。

面对这种现实状况，斯诺曾深情呼唤：我们失去了许多未加利用的大好时机。应当给两种文化结合创造机会。因为在人类思想活动史中正是在这些地方容易出现突破。这两种文化结合而产生的“第三种文化”已在到来^①，他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

“现在机会来了”^②，让我们进行尝试。

① 参阅丁守和等（主编）：《中国文化》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59—465页。

② 参阅丁守和等（主编）：《中国文化》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59页。